

专业培养目标的转变与高校学分制的未来发展^{*}

吴文俊

(南京财经大学 教务处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 要 在高校专业培养方案中,培养目标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它统领了专业培养方案的整体设计与规划。随着高等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变迁,特别是包括社会价值和高等教育价值观念在内的情境变迁,这一项目正由“国家计划订制”向“适应社会制订”转变,以此为切入点,结合高校办学的实际,提出高校学分制理念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是长期的有限度学分制。

关键词 培养目标;学分制;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3)04-0057-03

学分制是一种以学分为计量单位衡量学生学业完成状况的教学管理制度。与学分制相对应的是学时制,学时制是以学习时间(一般是年限)为计量单位来衡量学生学业完成情况。仅从表面上来看,学分制与学时制的差别并不大。如果我们把以学习时间为计量单位的学时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一下学分置换,学时制也可以表现为学分制。但从实质上来看,这两种不同的教学管理制度背后的支撑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区别在于学生学习的自主选择权的有无及其大小。打一个切近的比喻:学时制条件下,不同的学生(至少是同一专业的不同学生)食用着“通过层层计划制订下来同样品种规格的“套餐”,而在“完全学分制”条件下,不同的学生可以完全按照个人意愿“自主点菜”。

自1980年代开始,学分制已经成为我国高校教学管理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作为教学管理改革成果之一,我国多科性或综合性大学现在一般实行学年学分制,即建立在学年基础上的有限学分制。从大的背景来看,是高校教学管理工作与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从我们制订和执行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具体操作来看,是我国高校专业培养目标转变的必然和必须,而且,正是这种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决定了我国高校学分制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我国高校专业培养目标的转变及发展

人才培养目标,是高校专业教学计划的必备内容,可是编制教学计划时,我们往往对它关注较少,也较少地把它当作一个问题予以深入地思考。分析我国建国50多年来的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近些年的发展,可以发现我国高校的专业培养目标经历了由“国家计划订制”目标向“适应社会制订”目标的转变,而且,这场转变正在进行之中。我们不妨把它们分为两个阶段,即计划体制阶段和社

会主义市场阶段。两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理论支撑,高等教育在这种多元因素的影响下,高校专业培养目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这种不同的特征直接影响了高校教学管理制度是实行学时制还是学分制。

1、计划体制下高校专业培养目标:以社会或国家本位为基础的“国家订制”目标阶段

1950年前后,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本来就低下,加之经受了长期战争,除了政治体制改造外,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恢复经济,加快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我国选择实行了计划体制。“计划”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活动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按照前苏联模式对旧的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造后,高校被纳入政府体制内部,同样实行计划体制。在这里,国家是唯一的投资、办学主体。

从社会价值理论来看,社会本位的,更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国家本位的价值观如同“计划”一样统一,整合了全社会的意识和物质活动。在计划体制条件下,大学,是国家人力投资的工具。国家既是高等教育的生产者,也是高等教育的消费者;既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者和所有者,也是高等教育产品的购买者。高校是隶属于国家或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或其部门)的知识机构,其本身也相当于政府的一个部门,是政府机构和体制的一部分,它从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被当作是履行政府的职能,高校的教师、管理者和学生是现实的或未来的“国家干部”。

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至少与21世纪的今天相比,在相对封闭的中国大地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要缓慢得多,未来似乎更易预见。国家根据自身的目标制订社会发展目标,并把这个社会发展目标层层分解,直到高校的人才培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高校的

^{*} 收稿日期 2003-06-13

作者简介:吴文俊(1966-)男,安徽安庆人,南京财经大学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万方数据

人才培养,其目标是与一个“现实的已知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按照计划好了的过程有计划地执行着计划。

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我国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另外的表述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到199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教育方针的内涵有所调整,表述为“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总的思路与框架仍然是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没有给个人留出应有的空间。具体到高等教育,1950年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教育部颁发了一系列本专科高校的“暂行规程”,都明确提出新中国的高等学校要“适应国家建设的急需……培养通晓……专门……人才”。极为严格地选拔极少量的青年,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与补助,能使其在良好的条件下,按预定的程序和内容享受高品质的教育,其最终则是要求这些青年必须成为“适应国家建设的急需”的专门人才。

这些,是人才培养目标在宏观上和整体上的表述;而到了高校,专业的培养目标按照计划的规则被设计为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这些目标,相同的专业是一致的,统一在“国家建设急需”的原则框架下,由国家、学术集团或其他利益团体制订,作为统摄专业教学计划的指导思想或教育教学活动结果的标准。人才的质量标准(在教学计划中称作培养规格)也是由国家计划确立的。除了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表达为“红”)外,专业上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表达为“专”)。而人才则是计划的产物,因为人才的培养过程也被纳入国家规划之中。高校实行计划招生、计划分配,教学上实行岗位性很强的对口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所以,学生在如此严密的计划范畴内,不会也不必有自主选择学习的可能性。一旦学生通过一定的考选机制进入到高校的某一个专业以后,不仅在专业上基本无权作出新的选择,而且,就人才培养过程来说,学生在校的几年内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纳入到各种各样的计划之中,不可能也不必要作出选择。即便毕业了,毕业生的去向也并非自主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是“校门一入深似海,从此选择不由人”。

在这种把选拔少数精英青年并把他们培养打造成国家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的大的高等教育目标条件下,计划发挥了它的优势,从苏联移植过来的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学时制能够适应这种人才培养的需要。选择需要成本,并且选择过程中充满了争论与歧义,把选择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的方案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选择的机会,让专业人员或其他权威代替其他人作出选择往往被认为是科学根据的,同时也是最经济的选择。以专业为基础,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设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规划人才培养和学习过程的“套餐制”正是我国高校曾经长期实行的学时制教学管理体制的写照。事实也证明这种方式在特定的时期是严谨的,也是高效的,的确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建设急需的人才。

2、市场体制下高校专业培养目标:建立在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相结合基础之上的“社会适应性”目标阶段

学分制作为一种教学管理制度,源于18世纪德国的选课制,在美国作为一种体现多元化和受教育者学习自主性的制度被高校建立,并被诸多国家所接受,在20世纪80

年代的国外引进大潮中被引入到我国的高校教学管理实践中。但是,在我国,学分制的社会基础直到90年代才开始建立。

从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和过渡,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开放的程度也越来越高,经济体制的转轨与改革,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促使改革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不断增大,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过渡,高校也由通过为少数人服务实现为国家服务的目标开始转向通过为更多的人服务实现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政策的实施,确立了高等教育的“准公共性”或“非完全公共性”的性质,自主性和选择权第一次通过投资经费支出的方式被明确了下来。

大学,仍然是国家人力投资的工具。国家,仍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乃至所有者,但已不再是唯一的投资者与所有者,国家参与高等教育产品的提供,但高等教育产品不单单由国家来提供,主体开始由单一走向多元,国家,也仍然是高等教育产品的消费者,但消费高等教育产品的不仅有国家,也有个人和社会。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这里,国家的概念开始虚拟,它逐步转移到人们的精神层面,成为社会活动的终极性目标,而政府、社会、个人的面貌开始清晰起来,成为相互依存协调共生的社会活动主体。人们的价值选择也不再遵循唯一的国家化原则,而是在“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前提下,追寻着社会的、个人的价值。这样,本位价值观就由单一的国家本位转向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相结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就建立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基础之上。市场及其规则成为影响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并向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渗透。

市场是人们进行交换的地方,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将发生变化,高等教育必须主动满足其消费者的需要,它的产品才可能被消费者所接受,同时高等教育才能发展。消费者满意度则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过剩经济和买方市场的出现,使很多合格产品不能成为商品,只能成为无人问津的“合格的废品”和“滞销品”,只有让用户满意的产品才能变成商品,才能创造价值。多元化社会产生的多元化的需要,它们都是主体性的需要。由于国家、社会、用人单位、学生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和期望是不同的,存在着需要类型和期望值的差异,高等教育越是能够满足这些需要,质量越高。“学生消费者”、社会消费者的需要和价值期望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调节器”。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必须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个人成长的可持续化相联系。这种联系被1998年的巴黎国际高等教育大会宣言表达为“适应性”。这也正是我们传统大学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此阶段,高校对其人才培养目标的关注就是对不同的需求主体进行需要类型和层次的分析,根据社会的需要改革其人才培养模式,以期用多样化的教育服务,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学分制就是对这种多样化需要,特别是对不同的学生消费者的不同需要的回应。

二、高校学分制的未来发展

学分制涉及到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许多方面,如弹性学制、学科建设、教学计划管理、学籍管理、学生管理等等。本文讨论高校学分制的未来发展仅讨论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在内的人才培养计划,而把重心放在知识体系与课程结构方面。

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知识机构,大学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需要是通过知识中介来开展的。

受教育者在进行自身的人力投资过程中,需要获得三个方面的知识,第一是外适的知识,即满足个人在职业与社会交往中适应外部世界需要的那一类知识,专业学术能力、操作技术能力等就属于这一类型的知识;第二是内适的知识,即遵循知识本身的内在逻辑必须获得的那一部分知识,这一部分知识在于把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有效统合在一起,使其成为内部相互协调融洽的知识系统;第三是个适的知识,即满足其个人智能、身心、个性等发展需要的那一部分知识,如个人对文学艺术、对历史文化知识的偏好等。从学术专业和社会生产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人们既然已经以社会职业活动为参照系的对高校的专业进行了规划设计,那么,受教育者外适的知识需求,基本上可以实现现在同一专业目标下的统一。但要满足受教育者千差万别的对于个性知识的需求,实行传统的学时制显然就难以实现了。

在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中,政府和社会的需要是共通的,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实现社会进步是政府活动的目标,也是政府举办大学,对人力进行投资的目的之所在。社会进步,从现实的条件来看,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民众整体政治思想、文化和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其二是社会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在高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中,这两个目标分别表达为体现大学毕业基本素质层次和范围的基础教育课程和职业活动方向的专业教育课程。人们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统一性,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从基本素质教育类课程方面说,人类的知识体系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表

参考文献:

- [1] 唐一科,杨天怡,霍丹群.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的改革与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1(01):14-16.
- [2] 陈冀平.学分制推行中的两个认识问题[J].华东师大学报(社科版),2001(5):37-40.
- [3] 武荣.学分制与课程体系优化[J].江苏高教,2001(5):72-74.

现为共通性,这是知识迁移的基础,但是不同的学科知识体系表达的手段与方式并不一致,而基于先天性的差异和后天的学习,受教育者对不同的知识体系及其表达手段与方式的可接受性和可获得性也各不相同,这就瓦解了实行完全统一的基本素质教育课程的基础。从专业教育课程来看,社会职业岗位并不象人们设计的专业大类那样数量有限,按照专业大类开展的专业教育只能在整体上满足某一类型职业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不可能满足千差万别的职业岗位要求。这样,专业大类的统一性与职业岗位要求的多样性就产生了矛盾。

从以上主体性需要的分析,可以看出,要满足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需要,按照传统,实行单一的全计划性学时制是无法实现的。

实行完全的学分制,从理论上稍作分析就会知道,这是难以实现的。从知识分工本身,我们能够体察到分工后的知识在满足社会和个人对大学层次需要上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从人的基本素质在大学层次的体现来看,这些知识与一个社会的基本准则与规范体系相联系,是人类生存的共同基础,对不同的受教育者采取相同的甚至是强制性的要求是必须的。从专业需要来看,学科专业大类的划分奠定了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职业岗位的多样性要求并不排斥学科基础知识的统一性。所以,在考虑受教育者的个人学习自主权过程中,完全的学分制是不必要的。同时从教学过程组织的经济性分析,也是不必要的。

而在实践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提供实行完全的学分制需要的条件。学分制首先在美国产生并得以推广,这与美国包括市场经济、多元政治、教育地方自治等体制在内的国情分不开的。学分制的基础和前提是选课制。美国康奈尔大学曾经开设有12500门课程,但也没有能涵盖所有学生完全自主选择所要学习的全部课程。

所以,我们认为,未来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将是学分制学时制与学分制的结合,或者说是当前普遍推行的学年学分制的进一步发展。

On the Shift of Specialty Training Goals &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redit System in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WU Wen-jun

(Stud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su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Training goal is an indispensable item in the specialty training programme of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for it confines the whole layout of the training pl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item is being transformed from "National Plan" to "Social Adaptability". Based on this point and the fac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credit system in the future may be long-lasting but with limitation.

Keywords: training goal; credit system; future development